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财税政策选择

——基于供需矛盾的视角

白彦锋 朱梦珂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但 2014 年进入到经济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换挡,随之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暴露了经济发展中的内生性与结构性问题。企业面临资本投入效率低下,用工成本增加、税费负担加重;居民则是面临收入分配不均、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作用形成了无效供给过多与有效需求不足的供需错位局面,导致了市场的非出清,进而抑制了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分析了当前一些政策对企业经营负担、生产供给的影响以及对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到现阶段企业供给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具体原因。最后提出解决此矛盾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 经济增长;供求矛盾;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7.03.010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7)03-0081-10

一、引言

2011 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状态,经济增速逐渐放缓;2014 年习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将中国的经济概括为“新常态”。在新常态下,GDP 增速换挡,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更趋平稳;2015 年中国 GDP 则是首次告别 7% 时代,增速仅为 6.9%,创 25 年新低;加之全球经济恢复疲软,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面临着巨大挑战。过去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调控,以刺激需求带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因收入效应的减弱而难以帮助经济走向复苏,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生产率,扭转结构性失衡的局面,让经济增长处于不断增长的生产潜能水平(文建东、宋斌,2016)^[1],进而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供给侧改革是在“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指导思想下,通过改善供给环境与供给制度来充分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贾康等,

2015)^[2]。由于当以投资为核心的总需求在急速扩张时,总供给虽会在之后的生产时期内随之增长,但存在滞后的累积效应(闫坤、鄢晓发,2008)^[3]。因此这种结构性改革的实质绝非是对需求的紧缩,而是通过对供给的及时调整来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本文尝试从过去传统供给要素的现状分析出发来考察当前供需错位的表现及原因,提出解决供需矛盾的相关措施,为解决新常态下供给瓶颈问题提供思路,并对供给侧改革助推经济增长做出展望。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伴随着经济增速合乎规律的下调而产生,宏观政策与经济发展结构都随之进入新的调整期,政府对待经济效益的理念也需从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数量逐步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转变(郭斌,2013)^[4]。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按照世界银行以图表集法计算的 2014 年人均 GNI 对各经济体进行划分,如表 1 所示: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与完善地方税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4ZDA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白彦锋(1976—),男,河北新乐人,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

表 1 世界银行对经济体的划分标准	
经济体分类	人均 GNI(美元)
低收入经济体	<= 1,045
中低收入经济体	1,046-4,125
中高收入经济体	4,126-12,735
高收入经济体	> 12,735
中国	74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我国当前处于中上等收入水平,事实上中国从 2010 年开始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诸如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的驱动。而这种传统依靠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也意味着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其本质就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如果不能有效迅速地进行制度变迁和政策转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就可能会出现增长停滞。而在经历了前期的发展积累后,我国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驱动要素进入一个瓶颈期,即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慢、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再能释放增长红利,仅依靠需求管理的“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消费)不足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因此需要将经济管理的重心由需求侧转为供给侧,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失衡进行一个纠偏,重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二、我国传统供给要素的现状分析

从供给要素来看,通常有五项:劳动力、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力、制度体制。前面三者被认为是传统供给要素,在中等收入之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三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相对于之前会有一个下降过程。

在劳动力方面,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65 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比从 1990 年的 5.6% 上升到 2000 年的 7.0%,再到 2014 年的 10.1%,劳动力人口占比缩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减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力。如表 2 反映从 2001 年开始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①整体呈下降的状况。

在投资方面,一方面自 1979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等措施,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

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的投资率也是从 38.3% 上升到 45.9%。大规模的投资带来了资本存量的累积,造成人均实物资本存量过多,存在资本边际产出的递减可能性,使得中国经济在跨过低水平阶段的经济稳态点之后,并不能进一步持续增加产出,而是在图 1 所示的 A 点附近徘徊。

表 2 我国历年劳动力参与率		单位(%)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劳动力参与率	81.6	80.8	80.0	79.2	78.6	78.0	77.5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劳动力参与率	77.1	76.7	76.4	76.7	77.0	77.3	77.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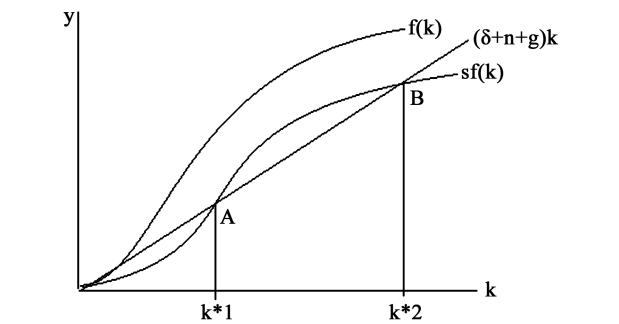


图 1 带有技术进步的索洛增长模型^②

为检验资本的边际产出是否在递减,建立生产函数: $GDP_{it} = f(L_{it}, K_{it})$

其中 GDP_{it} 、 L_{it} 、 K_{it} 分别为第 t 年第 i 个区域的 GDP、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为了简化模型,对人口变量进行处理,使其不在模型中出现。并化为取对数形式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ln gdp_{it} = \alpha + \beta_1 \ln k_{it} + \mu_{it}$, 则第 t 年资本存量的边际产出为 $\beta_1 \times (gdp_t/k_t)$ 。

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马海涛,朱梦珂(2016)^[5]的测算结果。通过实证分析,确定 β 取值为 0.75 左右^③,据此计算的资本边际产出如表 3 所示。

表 3 我国历年资本边际产出情况			
年份	人均 gdp(元)	人均资本存量(元)	资本边际产出
2003	9974.17	25683.27	0.291
2004	10895.04	30259.86	0.270
2005	11609.15	35469.25	0.245
2006	11978.17	41207.70	0.218
2007	12526.73	47506.44	0.198
2008	14966.32	54731.87	0.205
2009	14886.74	63377.12	0.176
2010	16056.69	73081.01	0.165
2011	17504.02	83127.91	0.158
2012	18007.87	94451.15	0.143
2013	19126.80	107140.27	0.13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测算而得

由表3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实物资本存量的增多,资本的边际产出在逐年递减,不断增加的人均资本量所带来的经济产出效益是不断下降的。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一直以反周期的总量调控政策为主,大规模的刺激投资,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济恢复,使我国在逆全球经济形势下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进入了对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传统拉动经济增长要素的边际收益在递减。反映在需求层面上,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④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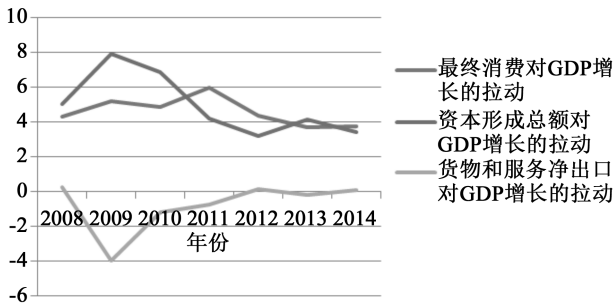


图2 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年鉴

其中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呈现出负值,受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我国的净出口总额整体持下降趋势,即便下降幅度有所减缓;而投资与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呈现出先增加而后又不断降低的趋势。再加上目前产能过剩问题,一批“僵尸企业”无法实现市场机制下的自然淘汰,若是再继续扩大投资以刺激需求,反而会恶化市场竞争的环境以及产能结构状态(李静,2016)^[6]。因此在这种新常态的背景下,不能仅采取类似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以短中期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政策,而是要进一步创造新供给,以此释放新的需求,通过供给环境的改善,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同时,增加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塑造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三、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供求矛盾的表现及原因

上文提到传统供给要素产出在下降,而我国处在这种中等收入跨越期所表现出的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供给方面表现是产能过剩,一方面是企业在前期投资过多,固定成本大;另一方面是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较重,受利润压缩的影响,

其实际产出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出现产能过剩。消费方面的表现是需求疲软,一方面是居民对国内消费品需求不足,储蓄率依旧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关注商品的品质,追求个性化、时尚化、环保安全的消费模式。因此出现了大量海外消费、代购与国内产能过剩之间的错位,国内的供给呈现出相对于需求过剩的局面。在当下供给侧改革中,有必要分析国内不能有效供给以及国内需求相对较少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更为有效的财税政策调整。

(一)企业供给相对过剩的原因分析

所谓产能,从理论上说是成本最低产量与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之差,而生产能力又是反映企业所具有的加工能力的一个技术参数,产能过剩未必就是单纯的产品过剩。当前出现的这种过剩状态,一方面是由于行业供给超过了行业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体现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下滑,亏损企业增加。虽然针对产能过剩概念本身存在一定分歧,且过剩标准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衡量标准,但从企业的角度看,当前的局面很可能是企业有效供给的过剩,也就是实际产出水平小于其具有的生产能力。而这又会受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即企业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财税政策等因素影响,进而产出水平状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1.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供给减少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企业通过廉价劳动力增加利润的优势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劳动供给的减少,工资的上升。另外工资的上升还可能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有关。设 $Y=ALf(k)$, $k=\frac{K}{AL}$,A为劳动效率,L为劳动力,f(k)为单位效率工人的产出,则

$$\frac{\partial Y}{\partial L}=Af(k)-f'(k)\left(\frac{K}{L}\right)=A[f(k)-f'(k)\left(\frac{K}{AL}\right)]=A[f(k)-kf'(k)]$$

$kf'(k)$ 为资本的边际报酬,f(k)- $kf'(k)$ 为劳动的边际报酬,设要素按边际产量取得报酬,则 $w=\frac{\partial Y}{\partial L}=A[f(k)-kf'(k)]$,根据表3得到资本边际报酬在递减,所以即使在劳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报酬

在上升。

从影响劳动供给的另一个因素看,居民对于劳动和闲暇的偏好发生了变化。卢卡斯和拉普英分析过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效应^⑤,在假设一个两期情形中,考察了工资与利率的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当人们预期到第二期工资上升时,会减少第一期的劳动供给;同时当利率下降时,会减少当期工作与储蓄的吸引力。即在利率变化与预期工资的干预下,居民会改变对劳动与闲暇的偏好,进一步影响到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当劳动力短缺、供不应求时,工资水平会上涨,减少了企业的利润水平。实际上我国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不断下调存贷款利率,放松银根,增加流动性,刺激投资,如表 4 列出了自 2012 年开始的贷款利率变化情况(不同期限的存款利率从 2012 年开始也是呈现下调趋势,限于篇幅,此处并未列出):

表 4	贷款利率变化单位(%)				
	6 个月以内	6 个月-1 年	1 年-3 年	3 年-5 年	5 年以上
2012/6/8	5.85	6.31	6.4	6.65	6.8
2012/7/6	5.6	6	6.15	6.4	6.55
2014/11/22	5.6	5.6	6	6	6.15
2015/3/1	5.35	5.35	5.75	5.75	5.9
2015/5/11	5.1	5.1	5.5	5.5	5.65
2015/6/28	4.85	4.85	5.25	5.25	5.4
2015/8/26	4.6	4.6	5	5	5.15
2015/10/24	4.35	4.35	4.75	4.75	4.9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由表 4 可以看出央行多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与卢卡斯—拉普英模型中结论相映衬,即利率的下调影响到居民的预期选择,改变了劳动供给,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鼓励投资未必能带动消费的长期增长,反而加剧产能的过剩,即出现一种以利率刺激投资的无效性。正如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所指示,无论目前人均资本存量位于黄金资本存量的左侧还是右侧,储蓄降低,投资增加,对消费的影响都只是一个瞬时的提升,长期而言,消费水平还是会下降。在这种政策影响下,不能保证居民需求长期稳定增加,也无法提升企业的有效供给。

2. 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影响

对于企业生产而言,在受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的约束下,推动产出水平的提高应关注在科技与企业制度等方面。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学

者们已从数理模型的角度论证了,将自然资源与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考虑加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后的结果,即当技术进步率、劳动力、自然资源、土地等要素均以固定比率增长时,总资本和总产量也以不变比率增长,则满足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且在这条路径上,原本资源和土地对经济的产出弹性越大,工人的平均产出增长率就越会因受二者数量减少的限制而不断下降,但如果当技术进步创造的增长动力足够大时,工人平均产出的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⑥。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驱动水平与他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程度呈正相关(王周伟、郭超,2014)^[7],因而面对资源要素的紧约束,创新驱动能使经济发展模式实现顺利切换,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图 3 反映了 2002 年至 2014 年研究与试验支出(R&D)占 GDP 比例的增长率与人均 GDP 增长率的变化图,可以看出经过前期各自增长幅度的波动之后,从 2012 年开始,随着科研投入占比增长的降低,带来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下降。因此技术投入力度的不足制约了产出的增长,当企业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的处境时,鼓励外部投资以带动消费需求,或是通过裁员压缩工资开支等都不能产生长期的积极效果,而只有关注于技术,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才能培育新的改变企业生产效益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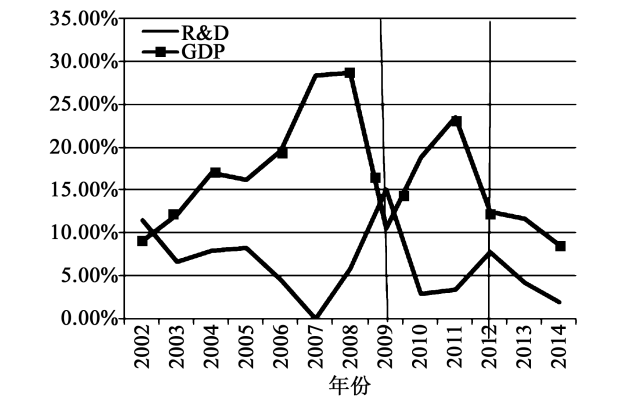


图 3 技术进步与 GDP 增长率的变化关系图

3. 税收负担对企业生产的影响

再从企业所面临的税收负担角度看企业的成本,我国企业面临的所得总税负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其他类型的经济体都高,表 5 是 2013 年至 2015 年不同类型经济体总税率的比较^⑦,根据世行对该指标的定义,大体可反映出企业所得税的税负状况:

表 5	各经济体的总税率		单位 (%)
经济体	2013	2014	2015
低收入国家	58.2	50.6	51.1
中低收入国家	43.8	41.6	41.7
中高收入国家	39.5	39.4	39.3
高收入国家	38.6	39.2	38.7
中国	68.7	68.5	67.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由表 5 可以看出我国在所对应的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中,面临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是相对较重的,尤其从 2012 年开始,企业利润的增长幅度开始收缩并出现负值,如表 6 所示。由于产能过剩行业,如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等多集中于工业,故选取工业企业作为参考指标。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下滑比较明显,相应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幅也相应下降,但其下降

表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及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率				单位 (%)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企业所得税收入
2006	30.15	30.02	31.76	30.44	31.73
2007	27.22	39.81	39.23	36.65	24.71
2008	-16.04	9.50	12.55	1.54	27.30
2009	2.47	22.62	13.02	11.72	3.23
2010	58.69	48.60	53.58	57.09	11.33
2011	11.67	3.16	15.73	19.35	30.57
2012	-7.79	-9.86	0.84	-2.81	17.20
2013	4.89	13.15	10.45	8.47	14.11
2014	-8.86	4.90	-0.33	0.33	9.88
2015	-24.57	-5.14	-6.75		

注:表中数据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表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情况				单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增长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增长率	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2006	24.99	1.19	24.60	1.45	
2007	27.38	1.19	25.20	1.46	
2008	31.54	1.26	20.76	1.51	
2009	43.31	1.66	5.31	2.18	
2010	24.31	1.60	30.76	2.12	
2011	13.29	1.50	26.20	1.94	
2012	14.15	1.56	8.84	2.01	
2013	9.49	1.52	10.32	1.96	
2014	7.11	1.53	5.97	1.97	

注:表中数据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且从工业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看,虽然增值税作为价外税,进项、销项都未含在收入及成本费用中,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但消费税、增值税这一类的流转税,其税负相对容易转嫁,若是转嫁给消费者,无疑就需要提高产品价格,而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条件下,生产者就需要承担部分税负,也同样会影响到产品价格,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收入水

平的幅度并没有利润多,从而表明企业在当下经济效益不景气的阶段,却承担了相对较重的税负,进一步压缩净利润空间,不利于企业实际产出的扩大、过剩产能的化解。从工业企业缴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来看,如表 7,虽然所涉及的相关税收的增长率在近些年不断降低,这可能与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降低有关,然而这部分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却没有较大变化。事实上自 2012 年以来,国家已逐步开启了营改增试点,这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一环,旨在降低企业的税负,但营业税大部分集中于第三产业,而对于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过剩产能行业来说直接从此政策中的获益相对较小,并不能有效地降低这些产业的成本,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平,间接作用于企业的利润。如表 8 所示,最明显的两个时间,一个是 2009 年金融危机后,一个是 2014 年,营改增的范围不断扩大,工业企业的应交增值税都比上一年有大幅度的下降,但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下降幅度相对较少,这又表明工业企业可以间接从营改增中获利。因为对于营改增的行业而言,其增值税抵扣链条打通,反而会促进

用于工业领域的消费，一定程度上能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

表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值税情况				单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增值税的增长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	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 企业增值税的增长率	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	
2006	25.66	26.17	25.43	24.60	
2007	27.49	27.46	24.91	25.20	
2008	29.60	25.09	21.95	20.76	
2009	-1.13	8.50	-0.99	5.31	
2010	28.49	28.61	31.90	30.76	
2011	17.04	20.65	22.80	26.20	
2012	12.41	10.39	10.98	8.84	
2013	13.17	11.77	11.30	10.32	
2014	1.55	6.58	1.37	5.97	

注:表中数据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另外从生产税净额的角度看,一方面生产税包含了政府对生产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征收的各种税、规费和附加;另一方面补贴包含了政府对生产单位的单方面收入转移,包括政策亏损补贴、粮食系统价格补贴、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收入等。如表 9 所示,依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部门承担的生产税净额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8.3%,远高于其他国家,说明企业负担的税收以及各项费用过高,税费支出的增长甚至超过了收入的增长,繁杂多样的税费支出会抑制企业的发展活力,影响企业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曲顺兰,2014)^[8]不利于供给环境的改善。并且在三大需求都不断回落的经济转型期间,企业经营者还要面对寻求新的市场订单的压力(倪红日,2015)^[9],经营收入的下降,加之成本费用的上升会极大损害企业生产供给的积极性。由于我国的税制建设过于注重税收的收入筹措功能,历次税改基本是在维持原有税负水平下进行的调整,在以高投资形成的资本要素主导型经济结构下,企业作为税源丰富的商品劳务税及企业所得税的直接承担者,自然易被税负重心所偏倚(庞凤喜,张念明,2017)^[10],而企业税负的增加,将直接加大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

表 9	2013 年世界主要国家企业生产税净额 占增加值的比例	单位(%)
	生产税净额占企业增加值的比例	
美国	8.5	
日本	3.8	
法国	4.0	
德国	-0.8	
俄罗斯	1.3	
印度	-1.1	
中国	18.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国内居民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

对于我国目前所处的中等收入跨越期以及经济结构新常态期,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经济质量效益的提高,无疑消费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 年、2012 年、2014 年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均超过了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了 50%以上。虽然当下的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不同于以往的需求侧,它注重的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是整个经济质量效益的提升,旨在刺激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但是企业作为微观主体的代表,其经营发展需要居民消费为之做出支撑,因此需要分析产能过剩的对应面消费动力不足的表现和原因,从而使政府在调控中能够改善供给结构,释放消费者潜力。

1.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的影响

居民的消费需求首先就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支出结构。在前文分析中提到,人口红利的消失、居民工作偏好的改变,资本回报率降低等因素使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但同时这也会使企业在效益下降、利润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减少雇佣劳动的工资水平,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显示,从 2009 年之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实际工资指数呈下降趋势,由 2010 年的 109.8 降至 2014 年的 107.2,2015 年有所改善为 108.5(均以上年为指数 100 进行测算),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水平。

再从居民就个人收入而负担的所得税来看,如表 10 所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增长率在 2014 年较之前年份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但个人所得

税占工资的比重并没有太大变化,同时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没有工资总额的增长率高,说明在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出现下滑的阶段,所承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并没有减轻。就个人所得税本身来说,其目的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减轻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不良影响。而根据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率除了在 2009 年和 2012 年低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其余年份均比它高。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很好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低收入群体,带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比例增长。这表明居民的工资所得依然承担了相对较多的税负,而对高收入群体的其他所得起到的征管力度是相对较弱的。因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既存在横向的不公平,又存在纵向不公平,一方面是针对不同所得适用不同的税率及扣除标准,使得纳税数额因数量相同但性质不同而产生差别;另一方面是高收入阶层具有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他们会在税收设计与征管漏洞下,通过逃税、避税来降低所缴税收,从而弱化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朱为群、陶瑞翠,2015)^[11]。再加之个人所得税分类模式的缺陷及其占 GDP 比重的偏低(在 2001-2013 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 GDP 比重均低于 3%),使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较为乏力(陈颂东,2015)^[12]。

表 10 个人所得税负及工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个人所得税占工资的比重	工资总额的增长率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2006	10.11	17.62	12.07
2007	10.81	21.47	17.23
2008	10.55	19.74	14.47
2009	9.80	14.16	8.83
2010	10.23	17.33	11.27
2011	10.10	26.83	14.13
2012	8.21	18.28	12.63
2013	7.02	31.24	7.74
2014	7.17	10.48	8.98

注:表中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总之,居民在实际工资水平不升反降且税收负担较重的情况下,会抑制劳动供给,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消费需求(丁为民,2016)^[13]。而这种反应对消费的影响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利于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另一方面中等收

入群体介于高低收入水平之间,与低收入相比,他们注重消费的质量;与高收入者相比,他们受收入水平的限制,更会追求消费的性价比,进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消费结构。当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很好地迎合他们的需求时,就会出现大量海购的热潮。事实上,2014 年我国消费者的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了 1060 亿美元,将近占据全球奢侈品销售额的一半(叶双瑜,2015)^[14]。当消费供给不能够适应消费升级时,供需的脱节会更加不利于刺激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带动经济发展。

2.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对需求的影响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则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有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显示,居民用于居住、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在上升。当他们将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时,自然用于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比例要下降。此外,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则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关,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首当其冲要确保地就是改革中托底政策的落实,只有增加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的供给,增加民生方面的投入,才能真正改善人民生活,提升人民消费生活水平。而这些因素要恰是培育人力资本,提升供给要素水平中必不可少的条件。根据表 11 所示:

表 11 企业、政府、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及财政收入增长率				
	企业	政府	住户	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率
2005	23.7	17.4	58.9	19.9
2006	23.7	17.9	58.4	22.5
2007	23.9	18.8	57.3	32.4
2008	24.5	18.3	57.2	19.5
2009	23.8	17.5	58.7	11.7
2010	23.6	18	58.4	21.3
2011	21.9	18.8	59.3	25.0
2012	20.6	19.2	60.2	12.9
2013	19.8	18.9	61.3	10.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在 2013 年比 2005 年上涨了 8.62%,住户部门占比仅上涨 4.07%,并且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一度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速可观,但政府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却存在一定问题。

以医疗卫生为例,我国政府用于医疗卫生总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不及所对应的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这一均值,而高收入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比例是我国的两倍,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例							单位 (%)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国	4.6	4.4	4.6	5.1	5.0	5.1	5.4	5.6
中高等收入国家	5.6	5.5	5.7	6.1	6.0	6.0	6.2	6.3
高收入国家	10.9	10.9	11.1	12.1	11.9	11.8	11.8	11.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据统计数据显示,在卫生总费用的支出中,虽然政府在卫生方面的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断增加,但增加的比重自 2009 年以后逐渐减少,从 11.04% 的增长率下降到 2013 年 0.5%;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下降,从 2009 年的 7.32% 的下降率减缓到 2013 年 1.34%,但可以看出的是个人支出比重的下降速度逐渐减慢,同时政府支出比重的增长率也逐渐在收窄。在 2013 年时个人这一指标的比重为 33.88%,政府为 30.14%,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负担还是相对较重的。此外居民还面临教育成本费用的上升,社保缴费占工资比率过高等问题,目前我国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保的缴费比例,企业占 29.8%,个人占 11% 左右,合计近工资的 41%,若加上公积金,这一比例超过 60%。我国在 2008 至 2011 年间用于社保、教育、医疗三大块的支出占公共支出的平均值为 17.3%、8.6%、2.9%,总计 28.8%,而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比重都达到 60% 以上^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及医疗服务体系的效率,均衡医疗资源配置、降低居民医疗支出负担是改革的方向。但由于我国“以药养医”的体制并没有在医改中得到根本改变,因此若是过多提高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财政支出,会隐藏着药企利益相关者的动机,并不能真正降低医药价格、减轻居民看病难与贵的问题。相比之下,提升体育健身财政支出,既是对国家推动体育事业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响应,又鼓励居民参加多种健身活动,以提高身体素质、降低生病概率,避免财神跟着瘟神走,使财政资金作用落实实处。总之我国在公共福利方面的供给还是相对匮乏,尤其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财政的社会保

障支出是供不应求,加之该项保障具有较强的惯性,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支出配置的低效率与巨大的支出刚性将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刘吕吉、李桥、张馨丹,2014)^[15],既不利于扩大内需,也无益于培育人力资本创造新供给源。

四、解决供需矛盾的相关措施及供给侧改革展望

根据上文的分析,供给相对需求的过剩与国内需求的疲软本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供给方面看要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给予工人更多的福利改变居民的劳动偏好;政府应降低企业税费,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并对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投资于科技研发方面的项目,给予补贴或是所得税扣除,而对于以前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加速折旧,在企业利润下降的时期减少所得税支出。

从居民消费疲软的角度,一是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快出台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提高资源税等具有调节资源配置的税种,并将个人全部收入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税基中,降低工薪阶层的税负,真正发挥个税“限高、扩中、提低”的作用。二是要降低间接税在总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我国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在 30% 左右,而发达国家在 60% 左右,美国更是达到了 75% 以上。间接税的比重高一方面是受其具有的“累退性”影响,使得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承担了沉重的税收负担^⑨;另一方面是当供给过剩时,尤其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作为市场价格的追随者,税负不易转嫁,那么无疑就加重了税负,压缩了利润空间,需要对企业创新、节能减排、更新改造等减税,鼓励企业向绿色创新方向发展(沈坤荣,2016)^[16]。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制是一种紧跟“现金流”的税制设计,做到了“即收现付”,其征收成本相对较低、征收效率相对较高。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且又面临提高直接税所带来的征管挑战,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税收结构的效率与公平效应,仍需着眼于长远考虑。三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来扩大城镇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放松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控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结合支持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降低城镇失业率,提

高居民收入水平。四是要加强民生福利方面的支出,提高科教文卫等支出比重,在使财政赤字率控制在合理范围的前提下,可使财政支出增长率略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率,且盘活财政资金存量、统筹资金使用力度,满足支出刚性增长的趋势,减轻居民和企业的事关民生方面的支出比重。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了财政分权体制,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离了合意水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上也应设置居民消费率、教育、医疗投入占GDP比重等综合指标来纠正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偏向,促使其能保证居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王明成、尤思梦,2013)^[17]。同时要设定合理的福利保障制度,在扩大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同时,要鼓励该群体参加就业,降低自愿失业率,避免产生“养懒汉”现象;对于知识型人才,应给予更多的工作福利补贴,改变其对于闲暇的偏好,使人力资本及时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生产中,降低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局面并降低企业在劳动成本上的支出,提高企业效益。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看,就是供给与需求的错位,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调整的滞后不足以适应需求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一方面通过注重新要素的供给,加大有效投资,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吸收消化现有的人力物力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结构性减税、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等政策来一定程度上放松产业管制、体制等约束企业活力的因素,促进民间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活力的提高。并且在优化供给环境的同时,推出与供给侧改革相配套的有关惠民生的增支需求政策来改善民生,从居民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角度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从“量”与“质”两方面推动消费需求。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转变要素供给、效率提升、激发创新创业等多方面来化解有效供给不足与需求外溢之间的矛盾,实现供求的平衡与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

【注】

①劳动力参与率是指年龄在15岁-64岁的人口从事

经济活动的人口比率;所有在特定阶段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提供劳力的人员。

②本文借用带有技术进步的索洛扩展模型只是说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可能性,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成因,故这里的技术进步外生化,或是看成劳动扩张型的技术进步。

③由于篇幅限制,文中并没有列出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事实上,不同区域之间的资本产出水平也不尽相同,参见马海涛,朱梦珂《财政转移支付、财政努力与区域经济发展》[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年第6期^[5]。赵志耘,刘晓路,吕冰洋《中国要素产出弹性估计》[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6期^[18]中测算当要素产出弹性随时间变动时,2003年资本产出弹性为0.74,2004年为0.81,从1979年到2004年的平均值为0.547,因此本文估计0.75也算是在2003年之后资本产出弹性系数估值的一个合理范围。

④拉动增长与贡献率有一定区别,其中拉动……增长……百分点=部分的增长量/总体原来的量×100%,贡献率(%)=某因素贡献量(增量或增长程度)÷总贡献量(总增量或增长程度)×100%。

⑤⑥模型推导过程参见[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4版,第149页至第152页,第29页至第31页^[19]。

⑦总税率度量企业在说明准予扣减和减免后的应纳税额和强制性缴纳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扣缴税款(如个人所得税)或收缴和汇给税务部门的税款(如增值税、销售税或商品及服务税)不包括在内。

⑧资料来源:《俞敏洪:中国社保缴费占工资比率过高》.腾讯财经.2015-03-04.

⑨资料来源:盛松成、梁斌、刘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我国企业税负亟待降低》.凤凰财经.2016-03-01.

参考文献:

[1] 文建东,宋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
[2] 贾康,姚余栋,黄剑辉等.“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6).
[3] 闫坤,鄢晓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8,(08).
[4] 郭斌.绿色经济:中国经济由量向质切换的现实路径[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3,(08).
[5] 马海涛,朱梦珂.财政转移支付、财政努力与区域经济发展[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06).

[6] 李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造经济升级版“新常态”——专访新供给经济学专家贾康[J].农业发展与金

融,2016,(01).

[7]王周伟,郭超.创新驱动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进作用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05)

[8]曲顺兰.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再造策略研究——基于企业、市场与政府的视角[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9]倪红日.经济新常态下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财税政策[J].税务研究,2015,(04).

[10]庞凤喜,张念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企业税负优化及操作路径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01).

[11]朱为群,陶瑞翠.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分析[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5,(06).

[12]陈颂东.中国宏观税负结构的国际比较[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5,(06).

[13]丁为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路径与实现条

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02).

[14]叶双瑜.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思考[J].发展研究,2015,(12).

[15]刘吕吉,李桥,张馨丹.人口结构变迁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4,(04).

[16]沈坤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治理思路的重大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6,(02).

[17]王明成,尤思梦.财政分权与政府支出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3,(05).

[18]赵志耘,刘晓路,吕冰洋.中国要素产出弹性估计[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06).

[19][美]戴维.罗默.高经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郝 涛)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Choice for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Based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AI Yanfeng,ZHU Mengke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10008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maintained a rapid growth. As the economy enters a new normal,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f the shift in economic growth have exposed the endogenous problem and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s faced by enterprises are the low efficient capital investment, increasing labor costs and increasing burden of tax and fe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citizens are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creasing living costs, etc, and 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leads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xcessive invalid supply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and causes the non-clearing market and inhibits the potential of economic productio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on the management burden of enterprises, production supply, the income level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the residents to obtain specific reasons for the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related measures to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Middle income trap ;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side